

2008 年以来民进党转型刍议 ——基于领导者和结构的视角

汪曙申*

摘要:民进党自 2008 年下台后一直在为重新执政寻找转型之路,然经蔡英文、苏贞昌两任党主席,并未解决阻碍其发展的诸多重大难题。基于领导者、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观察民进党。民进党的转型,一方面受到该党领导者的观念、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两岸关系、岛内政党政治、民进党派系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本文试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希望能研究民进党转型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民进党转型;领导者;结构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4)04-0016-08

DOI:10.13818/j.cnki.twyj.2014.04.003

在政治学研究中,个体作为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行为的基础要素,它涉及到人的成长经历、观念意识、社会心理、政治行为等多个方面。从人的角度研究民进党,除聚焦不同世代和派系势力外,特别要重视党主席的角色及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在岛内复杂的政治系统中,作为微观层次的个体虽有一定主观能动性,但放之大环境结构当中,其独立性是有限的,发挥作用亦是有条件的,始终受到所处历史时代趋势、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社情民意等结构性因素的规范和塑造。基此,本文试从领导者与结构的互动关系来分析民进党的发展转型。

一、领导者在民进党转型中的角色

政党是人的集合,它自然体现人的集体意志和行为。2008 年民进党在陈水扁执政 8 年惨败下台后,先后历经蔡英文、苏贞昌两任党主席。蔡、苏二者在人生经历、观念意识、政治经验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异,对 6 年多来民进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领导效能

合议共治和派系分权向来是民进党的政治文化传统。2008 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在检讨声中重新调整权力结构,曾任“陆委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被称为“女版马英九”的蔡英文在跨派系支持下,于 2008 年 5 月当选民进党主席,开启了“蔡英文时代”。蔡英文具有典型的学者性格,从政经历简单、政治包袱少,接手民进党后选择以“派系平衡”和“世代平衡”为原则布建中央权力结构,大力吸收和培养中生代势力,妥善照顾党内派系利益的多元化需求,其包容性的领导风格获得主要派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

* 作者简介:汪曙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在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主攻马英九当局执政疏失,在“立委”和地方县市长选举中实现持续性扩张。首先,民进党连续在云林、桃园、台东等多场“立委”补选中获胜,“立法院”席次跨过总数四分之一的门槛,获得提出“修宪”、“罢免”等议题的能力。其次,在2009年底县市长等“三合一”选举中,民进党不仅在原有云林、屏东、嘉义三县连任,还拿回号称“民主圣地”的宜兰县,政党得票率从上届的39%大幅成长至45%,创下民进党在历次县市长选举中得票率的新高。2010年5月,经过选举检验的蔡英文以90.29%的得票率成功连任党主席,党内领导地位得到巩固。2010年底,在《地方制度法》修正后首次举行的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和台南市的“五都”选举中,民进党虽未实现赢取“三都”目标,但在南部的高雄和台南获得大赢,“五都”总得票数和得票率均超过国民党。与国民党实力派朱立伦竞逐新北市的蔡英文,虽以约11万票之差落败,但选后在“谢系”、“新潮流系”、“游系”等跨党派的支持下留任党魁,并在2011年党内初选中继续获多数派系力挺,击败苏贞昌取得民进党“大选”候选人资格。在两任四年的党主席期间,蔡英文深谙政治是平衡和妥协的艺术,懂得释放权力与派系分享,以柔克刚,逐步巩固了党内权位,创建了一个相对稳定有力的领导中枢,为民进党在2008年惨败后逐步恢复元气、重新出发创造了条件。

2012年“大选”是国、民两党围绕两岸政策的一场决战,蔡英文因在论述上先天不足,终在输给马英九80万票后辞去党魁,民进党步入苏贞昌领导时期。2012年5月,1947年生的苏贞昌当选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从基层出身,历任台湾省议员、屏东县长、“立委”、台北县长、“总统府”秘书长和“行政院长”,党政资历完整,属民进党“律师世代”的“天王级”人物。然而,苏贞昌因长期与谢长廷、蔡英文不和,上任后很难仿照蔡的做法继续维持超越派系的领导集权,遂以苏系子弟兵为核心全面把持权力中枢,一面向“新系”、“绿色友谊连线”释放部分决策权以巩固同盟力量,一面支持游锡堃参选2014年新北市长以拉拢“游系”和“基本教义派”。从2012年5月到2014年5月,苏贞昌在“冲、冲、冲”的政治性格下,以派系划线的方式领导民进党,试图强势收拢和分配权力,但根本无法整合蔡英文和谢长廷的势力,结果强化了民进党的“老人政治”,导致党内分歧和裂痕进一步加深,派系斗争呈现扩大化趋势。

在苏领导期间,蔡英文在民进党正式体制外“另立门户”、“另树旗帜”,通过小英教育基金会网罗力量,勤走基层保持媒体曝光度,并屡屡对苏贞昌的领导提出质疑和批评。在党内派系分裂的局面下,民进党出现“两个党中央”、“两个太阳”,苏贞昌形象老、格局小,在蔡英文的光环下沦为“弱势党主席”。有评论称,“这是民进党内首次出现‘造反派’凌越‘当权派’的政治异象”^[1]。显然,民进党在蔡、苏治下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权力风貌,与该党领导者的权力基础、风格和能力息息相关,并直接影响到民进党的转型之路。尤其是,在苏贞昌的弱势领导下,多头分化的权力结构使得民进党始终难以迈出转型步伐。

(二) 格局理念

在影响民进党发展转型的内部因素中,党主席扮演着提出突破性理念和创新性论述的关键角色,也即在民进党面临内外重大现实挑战的情形下,领导者能否为克服政党发展瓶颈提出新理念和论述,以大开大阖的政治格局凝聚党内共识,激发转型动力,开辟民进党发展的新空间。“勇于超越传统和挑战历史,正是转型领袖的基本要件。”^[2]如,在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探索转型过程中,党主席许信良、施明德曾提出“新兴民族”、“大胆西进”、“联合政府”、“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大和解”等一系列理念和论述,对当时民进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入21世纪,民进党在执政和在野两个阶段掌握的资源 and 处境有别,但在深层次上需要处理的两大关键问题是相同的,即如何处理与中国大陆及政治对手国民党之间的关系。2008年以来,蔡英文和苏贞昌在处理这两大问题上的格局与理念都深刻影响着民

进党的发展。

一是关于两岸关系。蔡英文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教授、政治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不仅熟悉法律和国际贸易理论,且从1992年到2000年担任台“经济部”贸易调查委员会委员,参与协助台湾当局国际贸易事务谈判,特别是在台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咨询角色。同样,蔡英文在20世纪90年代就任“陆委会”咨询委员,曾参与李登辉“两国论”的起草工作,在陈水扁执政后又任4年“陆委会主委”,可谓长期观察、研究和处理两岸事务。深度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和两岸事务的背景,使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具有较强的政策论述能力。回顾蔡的两岸论述,其顽固坚守“台独”立场,否认“九二共识”,提出“从台湾认同出发、以台湾价值为核心”,有选择地利用“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政策框架。蔡英文明确反对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发展路线,要求在国际和区域架构下形塑与中国的关系,“由世界走向中国”,维持两岸“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关系。正如绿营学者王崑义指出,蔡英文还是希望把台湾建设成“世界的台湾”,而不是“中国的台湾”。^[3]蔡英文的学者特质和逻辑思维,使其在提出两岸论述时擅长采用更具迷惑性的模糊概念,更善于政治上的柔性包装和软性推销。

苏贞昌则明显不同,从基层选举打拼起家,曾自称“从台湾尾选到台湾头”,但对两岸关系和国际事务一向较少涉猎,被岛内媒体直指缺乏“两岸观”和“国际观”。确如“独派”人士辜宽敏所言,苏贞昌是“地方型的政治人物”。2012年5月苏贞昌接任民进党主席后,在内外压力下尝试调整两岸政策做法,主持恢复“中国事务部”,并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然而,苏贞昌毕竟缺乏历史纵深和理论厚度,又不具有党内整合能力,不仅排斥使用更加务实的“两岸事务委员会”的名称,而且排除谢长廷自任“中国事务委员会”召集人。结果,“中国事务委员会”仅是作为民进党内凝聚共识的机构,而非与大陆交流对话的平台。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称,“让民进党从开放格局逆转为内缩格局”^[4]。“中国事务委员会”由民进党各派系头面人物组成,背景多元,立场各异,对两岸关系的看法甚至南辕北辙。在举办9场“华山会议”后,“中国事务委员会”提出“对中政策检讨纪要”,以各方妥协之下的模糊的“宪政共识”作为与大陆交流的基础,提不出大开大阖的新论述。如该“纪要”继续认为,主张“台独”是当前台湾的主流民意,称“台湾与中国分别为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两年间,苏贞昌的两岸论述回到“台湾前途决议文”,停留在“积极面对中国”的口号式表态,其所提出“台湾共识”,“生存是王道、民主是基石”等概念不仅虚渺更不具建设性;其将台湾产业外移和劳工失业归咎于过度依赖中国,称要“降低中国因素对台湾的介入、影响”,实际是找不到制约台湾社会发展的根源及有效的应对方案。2013年2月苏贞昌访问日本高调抛出“亚太民主同盟论”,称“台湾、日本、美国和韩国等有共同价值认同的国家,应该组成民主同盟,共同维持彼此所认同的价值与利益,确保区域和平”。“亚太民主同盟论”一经提出,苏贞昌就被岛内舆论批评为“走冷战的回头路”,其战略视野再次遭受质疑。

从上述比较看,蔡英文、苏贞昌在“台独”核心立场上并无本质不同,但蔡的政策论述能力更胜一筹,更精于对路线政策的包装和行销,在巩固绿营基本盘的同时,对中间选民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二是关于蓝绿政党关系。在政党竞争问题上,蔡英文与苏贞昌的立场较为接近,都主张以对峙对立的激进做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视情结合“议会路线”和运动路线。2008年蔡英文上任之初曾以激进的“街头路线”进行“反马”、“反中”,结果因处理失当被社会贴上“暴力小英”标签,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更伤及社会形象。蔡英文不得不重新调整策略,提出“有执政经验的在野党”口号,寻求重塑民进党“清廉、勤政、爱乡土”的传统价值。为此,一方面协调党内各路派系势力,加强整合社会力量。如岛

内学者称,“以结盟的策略,善用人力资源,不忌讳其他派系的挑战,这是蔡英文让民进党从废墟中快速站起来的赢的战略”^[5]。另一方面,逐步强化“议会路线”,以体制内的“立法院”斗争为主、体制外的运动路线为辅,全力杯葛马英九施政。2010年“五都”选举后,“小英路线”进一步确立,蓝绿政党关系在2012年“大选”的刺激下日益白热化。苏贞昌执掌民进党后,重新带领绿营走向街头路线,大动作举办多场游行活动,利用岛内民意直接挑战执政党的政策,并在“立法院”以霸占主席台瘫痪议事的手段极力杯葛包括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内的马英九当局重大施政。然而,在蔡苏任内,民进党走向对抗路线却忽略了政策储备,导致在“二代健保”、证券交易所得税、年金改革、台湾对外经济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难以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直至在“太阳花学运”中沦为社会运动的配角。

6年多来,民进党始终奉行零和博弈的斗争哲学,不仅导致与国民党无法建立高层沟通和对话机制,缺乏基本的政党互信,而且使民进党不断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漩涡,让其标榜的“理性问政”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重塑政党形象亦迟迟难以见效。

(三) 社会路线

在全球化竞争时代,找准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是政治人物的重要责任。近几年来,台湾社会阶层的流动日益固化,以公民直接参与和街头抗争为特征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反映出岛内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国民党当局执政的不信任感上升,以及对民进党扮演在野监督角色的不满。2014年5月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一项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国民党的好感度仅21.8%,民进党也只有28.6%^[6]。社会运动持续高涨的结果,不仅冲击岛内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治理体系,而且给国、民两党的发展带来全新挑战。

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曾以“中间偏左”路线成功扩大社会基础,但2000年执政后逐步与社会运动拉开距离,直至大幅脱节,暴露出民进党十余年来在理念、价值、形象、组织、行动力等多方面存在的缺陷。2008年蔡英文任民进党主席后,加强地方党部功能和地方服务能力,密切与基层党员的互动;将民进党的发展与社会运动相结合,从组织上改“社会发展部”为“社会运动部”,优化与公民社会的对话,提出维护“三中”(中下阶层、中小企业、中南部)利益诉求。在2012年“大选”中,蔡英文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进一步走向偏左路线,刻意突出岛内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以“分配正义”为口号吸纳所谓“三中群体”的支持,曾掀起一股不小的声势。2012年5月苏贞昌上任后喊出“负责任的最大在野党”,从振兴产业、强化地方、照顾家庭和协助青年等领域提出“有感经济”对策,但未能准确研判和妥善因应岛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和能量,导致民进党不仅无力领导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反而在社运中遭遇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危机。

相较而言,蔡英文败选卸任后,并未放弃思考如何重塑民进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而是通过小英教育基金会大幅加强与产业部门的联结。2013年8月,蔡英文在主持第四场“对中政策扩大会议”时提出,民进党应该思考如何与公民社会建构有意义的伙伴关系。此后,她又指出,“民进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必须做出抉择,不能再把街头让给了公民团体”^[7],并提出“重建民进党与社会的信任契约”。2014年5月,蔡英文再次回锅民进党主席后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即是将政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改造为民进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平台,与公民团体展开全面性对话。蔡英文确实较苏贞昌更掌握民进党走社会路线的方向和路径,但如何弥合民进党与公民社会所扮演不同角色的差异,化解在某些议题上的对立紧张,进而实现政策上的衔接和整合,将社会运动力量吸纳到民进党的支持光谱中,仍面临很大挑战。

二、结构对民进党转型的限制

在当前台湾这一特殊的政治系统中,民进党领导者想要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相对的,能量是有限的。民进党多年来转型步伐缓慢,与该党领导者的政治意愿、格局、能力虽有关系,但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结构因素的限制。

(一) 两岸关系结构

近 10 年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经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具战略性意义的是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以及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陆的稳定崛起和美国权势的相对衰减。规范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最大结构是海峡两岸实力对比状况的变化。大陆对台湾的绝对优势持续扩大,大陆因素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全面增强,使得民进党以激进路线挑战大陆“红线”的机会日益限缩。以 GDP 而论,2000 年大陆是台湾的 4 倍,2008 年为 11 倍,2013 年为 17 倍。今后 10 年,大陆将稳定保持 7% 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影响力将有一个质的跃升,经济和军事上对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国际上“一个中国”框架愈益巩固,“台独”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市场,在岛内社会的话语权也在逐步减弱。

岛内不少人士已体认到上述形势变化对台湾未来的深远影响,并对岛内在发展方向上的严重分歧表示忧虑。两岸关系结构至少在两个方面制约和规范着民进党。第一,如何维护和平价值。民进党内主流意见认为,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的优势在于“和平”,民进党的优势在“主权”,如何在二者之间求取平衡是政策突围的关键。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 2013 年 5 月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第 1 次会议的引言报告中,将“和谐两岸”、“顺畅交流”列入台湾人民的优先偏好,并承认国民党在上述两方面获得岛内民众更多肯定。林浊水也认为,“国民党的主场在和平”^[8]。目前,国共两党在“一中框架”上的共同立场日益清晰,民进党始终反对“九二共识”,却找不到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关系的替代论述。美国在 2012 年“大选”中出手支持马英九连任,显然是对两岸执政当局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肯定,也是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缺少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的信心的一种表现。经过败选的教训,2013 年 11 月蔡英文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公开称,如果民进党在 2016 年重新执政,将与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然而,民进党领导者若不在“九二共识”、“一中框架”上给予明确的答案,继续靠“台湾共识”之类的模糊辞藻是无法突破结构性困境的。在大陆崛起的大势之下,民进党论述维护和平价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策略上的拖延只会使其陷入更大战略上的困境。

第二,如何提升两岸交流合作。2008 年以来,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逐步建立和发展,两岸关系内涵在 21 项协议的推动下不断丰富深化,巩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各项基础。根据 2012 年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一项民调显示,愈七成岛内民众赞成民进党与大陆暂时搁置对立主张,共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然而面对国共两党加强对话合作,民进党与大陆的交流仅限于党籍执政县市市长和少数“立委”及学者,联系管道少、对话层次低、交流领域窄等局限性十分突出。陈明通坦承,民进党面临着“博鳌亚洲论坛、国共论坛、海峡论坛、紫金山论坛、和平论坛”等“五大平台”的压力。“中国事务委员会”第 2 次会议的共识意见认为,“对中经济是台湾无法回避的课题”,“要建立公平的两岸经贸关系”。“对中政策检讨纪要”也承认,“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两岸交流是必然的趋势”,民进党“应该积极自信参与两岸交流,包括智库与地方执政县市的城市交流”。6 年多来,民进党试图逐步改变“逢中必反”的僵化做法,通过策略性调整去塑造不排斥与大陆交往的形象。但民进党领导者始终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立场,蔡英文的“十年政纲”和苏贞昌的“台湾共识”目的是为选举造势和动员的政策“内销”,难

以构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框架。未来十年,面对中国大陆的战略自信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愈益巩固,以及全球化纵深发展带给台湾社会的空前挑战,民进党想要重新执政,必须提出能有效应对复杂时局的现实方案。任何一位致力推动民进党转型和有意夺取政权的领导人,都无法回避大陆因素,只有在两岸政策上取得突破性转型才能创造机会。

(二) 蓝绿对峙的政治结构

正如有学者所言,“对抗是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政党互动的主要方式及突出特征”^[9]。自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以来,这一对峙分立的政治结构不断走向激化,表现为政治理念上的对立性,权力分配上的排他性以及基本政治互信的缺失。马英九执政不佳致使岛内民怨上升,民进党又提不出足以指引台湾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导致台湾社会对政党政治的信任赤字扩大。2014年4月台湾指标民调发布岛内民众政党立场倾向追踪分析,其中26.1%倾向泛蓝,29.8%倾向泛绿,41.5%持中立态度。该结果显示,岛内蓝绿政党基本结构仍在,但因民众对国民党、民进党双重不信任的心态扩大,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岛内社会力量出现集结上升态势。当然,在台湾现行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体系运行机制下,选举仍然依靠长期的组织经营、基层桩脚布局,短期、临时性的资源挹注和缺乏政治基础的理论宣传并不能真正换来选票上的回报。因此,“第三势力”试图以“公民运动”为旗帜收编这股中间社会力量仍面临诸多限制。在今后一个时期,蓝绿对峙的二元冲撞结构仍是民进党转型必须面对的最主要政治环境。

第一,长期选举政治恶性竞争将加剧国、民两党之间的对立态势。一般健康的政党政治应具有调整弹性和对话空间,台湾内部竞争性选举却因特殊的历史背景而走向极端化。民进党“美丽岛世代”和“律师世代”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带有统独二元对立和反威权的鲜明色彩,“野百合世代”和“立法院助理世代”虽然历史包袱少,但多依附于“美丽岛世代”和“律师世代”,独立发挥政治作用的空间较小。加之,台湾选举政治是赢者通吃与零和博弈的权力游戏。这些都决定了蓝绿阵营的政治斗争将长期处于难以调和的尖锐对立局面,民进党从根本上改变“逢国必反”的政治行为相当困难,这将极大地限制其推动转型的方向和力度。

第二,民进党将始终面临国民党大陆政策的竞争压力。在国民党日益走向“本土化”和马英九推行“不统、不独、不武”的偏安政策下,国、民两大党在统独问题上的分歧突出表现为坚持和反对“一中”的矛盾。国民党大陆政策论述逐步体系化,包括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两岸非国与国关系”,“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等,至少带给民进党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面对国民党承认“一中架构”,民进党若想与大陆对话交流,至少必须先“一中”问题上有明确交待;二是民进党若向认可“一中架构”的立场移动,又担心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更进一步,届时恐将造成被动的“政策追赶”,并引发“台独基本教义派”反弹。这两大压力所内含的矛盾和冲突,是民进党实现转型必须要面对和承受的。

第三,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发展对美关系上处于竞争态势。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确保海峡两岸和平稳定成为美国台海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也是其在2012年“大选”公开支持马英九连任的最主要原因。苏贞昌任党主席期间恢复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坚定追随美国战略调整,以期重建民进党与美国的互信。然而,互信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言行互动的反复验证才能建立。目前,国民党大陆政策完整统一,并已被两岸关系发展实践证明其有效性;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则缺乏“全党共识”,领导者或是单一派系的立场没有贯彻于全党的合法性。因此,在国、民两党竞相争取美国支持的情形

下,美国对民进党转型的态度及如何处理与国、民两党的关系,将对民进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 派系倾轧的党内结构

有政治学家认为,“政治的要义隐藏在政治行为的表象之下”^[10]。营造时势的领导者不仅将行动纲领建立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而且具有整合政党内部力量、提出新政策思维的能力。目前看,民进党转型面对的最主要党内结构是派系政治和观念分化,其结果是造成在两岸政策上缺乏统一的战略设计和策略运用。

一是两岸政策主张基本沦为党内权斗工具。苏贞昌在任内一直以蔡英文为角逐2016年“大选”的党内首要对手,遂在战术上全力拉拢“独派”,强力排斥与蔡关系良好的谢长廷去推动以“宪法共识”、“宪法各表”为内容,以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朝国民党论述靠拢为方向的政策调整,还在谢排除阻力登陆访问后集结深绿势力进行反制。民进党“立委”陈唐山、台联党“立委”许忠信、已故前民进党“立委”蔡同荣等发起成立“反一中顾主权连线”,猛烈批判谢“过度倾中”、“被中国统战”。“台独理论大师”林浊水甚至直接攻击谢的论述就是国民党的“一中”,不可能成为民进党的主张^[11]。相对务实的“新潮流系”也主张“政策从宽、论述从严”,对谢长廷的“宪法各表”不表认同。在“苏系”和“独派”的联合夹击下,谢长廷坦承犹如“万箭穿心”、“站在浪头上”。其结果是,在苏贞昌、蔡英文的双头权力结构下,二者在两岸政策上均走向保守,不敢贸然提出突破性论述。派系利益的激烈竞争压倒了民进党发展的整体利益,极大地迟缓和转型步伐。

二是观念分化致使论述多头而难以统一。民进党的社会基础由不同世代背景、政治经历、观念意识和社会阶层的群体所构成,这决定了党内不同势力在两岸主张上的分歧难以避免。近两年来,“务实派”认为,对大陆持开放交流态度是低层次的政策调整,不足以突破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深层困境,相互矛盾的“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常国家决议文”的共存造成与大陆难以建立基本互信。“务实派”代表、曾任“大陆委员会副主委”的童振源甚至抛出“修改台独党纲论”,通过“中华民国决议文”以确立“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立场。与国民党不同,民进党“务实派”向“中华民国论述”位移建立在“事实台独论”之上,将“中华民国主权”涵盖范围仅限缩于“台、澎、金、马”,乃以工具思维选择性接受“中华民国”。即便如此,“保守派”始终坚持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认定两岸政策无须调整,在“台独”核心立场上的任何松动都将动摇绿营支持者信心,削弱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坚持维护民进党党纲中的“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立场,甚至称“正名制宪比重返执政重要”。前“考试院长”姚嘉文也强烈反对修改党纲,将民进党的选举挫败归因于“不谈台独”。民进党内部对待两岸关系的主张分化,源自不同派系群体的理念意识、个人经验和政治利益,整合难度之大使得蔡英文、苏贞昌只能妥协接受作为党内最大公约数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种分歧还将继续成为制约民进党转型的深层次的观念障碍。

三、结论

从2008年迄今民进党转型过程看,任何政策上的新思维和突破不仅需要领导者的能力和魄力,而且受到多重复杂结构性因素的规范和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民进党转型的郭正亮曾指出,“沟通协商文化的贫血,决策整合机制的不足,个人英雄主义的泛滥,恐怕才是转型之痛的根源。”^[12]如今,时代、环境和潮流都在变,重新领导民进党的蔡英文必然会为2016年“大选”重新思考和构建两岸论述,探索民进党与大陆交流对话和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可行方案。可以确定的是,蔡英文下一步

无论以何种策略推动民进党转型,都将继续受到本文所述三大结构的制约,结果可能走向一条妥协平衡之下的折中路线。

注释:

- [1]《体制空洞化,民进党危机》,台湾《联合报》社论,2014 年 1 月 29 日。
- [2]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27 页。
- [3]王崑义:《民进党的“两个太阳”》,香港《中国评论》2013 年 12 月号,总第 192 期,第 31 页。
- [4]《民进党中国事务会,苏贞昌亲任召集人》,台湾《联合报》,2012 年 11 月 22 日。
- [5]王崑义:《“抢权、抢人、抢地盘”:民进党 2012 前的大戏》,香港《中国评论》2010 年第 6 期,第 40 页。
- [6]台湾指标民调网站,http://www.tisr.com.tw/? p=4184#more-4184,上网时间 2014 年 5 月 30 日。
- [7]《蔡英文的空与国民党的虚》,台湾《中国时报》,2014 年 1 月 14 日社论。
- [8]《林浊水反对“宪法各表”取代“九二共识”》,台湾《中国时报》2013 年 7 月 26 日。
- [9]郭红斌、林劲:《当代台湾政党互动分析》,九州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6 页。
- [10][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5 页。
- [11]《林浊水:宪法共识难成党主张》,台湾《联合报》,2012 年 10 月 8 日。
- [12]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4 页。

(责任编辑 毛仲伟)

Discussion on the DPP's Transition from 200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er and Structure

Wang Shushen

Abstrac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has been striving for transition to return to power since it was out of office in 2008, but until now it has not resolved several thorny difficulties which block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Tsai Ing-Wen and Su Tseng-Chang. Th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er,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can help us observe the DPP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The DPP's transitio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idea and ability of its leaders, but also restrict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ectarian politics in the DPP.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PP's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two basic factors, which may offer some useful thinking on the study of the DPP's transition.

Key Words: The DPP's Transition; Leader; Structure